



芝加哥经济学派

[美] 蓝尼·埃布斯泰因 (Lanny Ebenstein) ◎著

苏娜◎译

雅各布·瓦伊纳 | 弗兰克·奈特 | 亨利·西蒙斯 | 米尔顿·弗里德曼

乔治·斯蒂格勒 | 亚伦·戴雷科特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芝加哥经济学派

[美] 蓝尼·埃布斯泰因◎著

苏娜◎译

CHICAG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

Lanny Ebenste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芝加哥经济学派 / (美) 蓝尼·埃布斯泰因著; 苏

娜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

书名原文: Chicagonomics

ISBN 978-7-5086-6946-5

I. ①芝… II. ①蓝… ②苏… III. 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3270号

Chicagonomics

Text Copyright © 2015 by Lanny Ebenste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芝加哥经济学派

著 者: [美] 蓝尼·埃布斯泰因

译 者: 苏 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 01-2016-3343

书 号: ISBN 978-7-5086-6946-5

定 价: 58.00元

印 张: 19.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人意料。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术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致当代自由主义者

序

这部作品论述了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我在经济政治思想史方面所著的第十本书，也是我专门讨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五本书。承蒙读者厚爱，备感荣幸。

我从2008年开始创作此书。在此期间，美国以及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鉴于此，我在结尾处提出了芝加哥自由市场传统在当前形势下的延伸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7年一场关于他的良师益友亨利·赛门斯的讲座上说道：“比起盲目追随某人的准则，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是更加真实的致敬。”¹本书则提出，通过恢复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来实现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中更大的经济平等。希望读者多加关注和支持。

本书所推荐的政策与传统芝加哥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在当代的应用一致。我呼吁回归到早期芝加哥学派关于适当的政府和经济政策的思想，特别是赛门斯对更大公平和累进税收重要性的观点。本书倡导

的政策实际上是那些在战后至 1980 年期间美国实施的政策。当时，尤其在累进所得税率达到最高值的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在国内外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和之前的大部分学术作品不同，我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区分开来，强调了他们各自在七八十岁时所持的激进的新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与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所表达的观点大相径庭。应该摒弃两人后来的观点，转向他们早期更加温和的立场。和几年前相比，现在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去评价两人的职业生涯。我希望，尤其是青年弗里德曼和晚年弗里德曼的区别能成为文学中的准则。当弗里德曼转向拥护政策时，包括安格斯·伯金、布莱恩·多尔蒂和威廉·鲁格在内的许多作者呼吁人们关注他渐进的激进化。

我对当代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保守主义也颇有微词，不过我希望这是合理和公平的。我关注的焦点是强调公共政策的芝加哥经济思潮。芝加哥经济学在公共政策方面成果卓绝。我希望，通过展示和剖析若干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家的思想，能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立的和衍生的贡献。正如芝加哥大学基于历史观点所理解的那样，古典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强大的平等主义元素。这种平等主义元素通过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获得。

我关注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有 J. 劳伦斯·劳克林、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亨利·赛门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首先对他们的前辈（从亚当·斯密到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展开论述。我希望，这些论述加上后面的文

献篇，能够提供和当代文献一致地看待亚当·斯密的全新视角。我之所以强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我希望能对他们的思想和发展进行崭新的阐述。

感谢这些为我之前的作品提供过采访的人们。本书中也包括了这些相关的采访内容。感谢莱斯特·戴尔瑟、托马斯·索威尔、萨姆·佩兹曼、史蒂芬·斯蒂格勒和埃德温·米斯。我还采访了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艾伦·沃利斯、D. 盖尔·约翰逊、拉里·斯亚斯塔德、拉里·哈耶克和亚瑟·塞尔登。他们都已辞世。我与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米德、罗伯特·福格尔等人有过信件交流。他们也都已故去。最近，有机会采访了乔治·舒尔茨并和大卫·斯托克曼进行了交谈。闲暇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查阅了相关档案，尤其是一些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相关的档案。

此外，我还要感谢与我在共同领域辛勤耕耘的许多学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浅。这些学者包括：安格斯·伯金、罗斯·埃米特、J. 丹尼尔·哈蒙德、克莱尔·哈蒙德、乔治·纳什、约翰·范·奥弗特韦德、罗伯特·李森、菲利普·米卢斯基、罗伯特·范·霍恩、托马斯·斯泰普尔福德、谢莉尔·卡斯珀、马克·斯考森、马尔科姆·卢瑟福、唐纳德·温奇、罗伯特·史纪德斯基和已故的沃伦·塞缪尔斯和亨利·斯皮格尔。每月与我共进一次早餐的好友约翰·巴斯比、鲍勃·卡西、约翰·凯、彼得·麦克道格尔和斯坦·罗登以及我的老教授汤姆·施罗克、纳尔逊·利希滕斯坦和杰瑞·詹姆斯在结论部分提供了建设性的思想，给我启迪。感谢艾伦·布拉德肖为手稿所做的工作。本书的错误和瑕疵与这些人无关。也许

会有很多人对本书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代自由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持否定态度。我希望说服他们，或者被他们说服。

蓝尼·埃布斯泰因

加利福尼亚 圣巴巴拉

2015 年 7 月 20 日

目 录

序	ix
引 言 芝加哥经济学之历史背景	1
第一章 洛克菲勒的大学与政治经济系	18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者雅各布·瓦伊纳	37
第三章 芝加哥大学之前的弗兰克·奈特	52
第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	68
第五章 亨利·赛门斯与累进税收制	78
第六章 考利斯委员会与凯恩斯	91
第七章 芝加哥经济学派	107
第八章 学术界的芝加哥经济学家	127
第九章 法律经济学与政治哲学	136
第十章 芝加哥的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	149

第十一章 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弗里德曼	162
第十二章 20 世纪 80 年代鼎盛时期与当代自由主义	177
结 论 芝加哥经济学的应用现状	187
附录一 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访谈	201
附录二 保罗·萨缪尔森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函	212
文献篇	215
注 释	252

引言

芝加哥经济学之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对芝加哥经济学的由来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其最重要的根源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头几十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以及英国政治哲学家和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作品中。斯密和边沁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边沁很多灵感都是从斯密那里获得的。两人与伟大的约翰·洛克（1632—1704）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一道，成为辉格党最初的古典自由主义队伍中最伟大的四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也是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四位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

斯密的著作促使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斯密的作品中，国家经济被视作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我维持的制度。它由政府构建但不由政府决定和指导。在斯密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斯密精辟的见解包括以下几点：当双方参与贸易时，均从中获益；比起利他

主义，明智的利己主义是更为可靠的社会基础；比起不太复杂的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更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经济活动、收入和财富在道德层面是有益的。斯密采纳的是完全现代化的方法。正如边沁所说，利他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数是衡量对错的标尺。”¹

至关重要的是，斯密和边沁坚称个体在体验幸福的权利上是平等的。因此，他们支持民主政策（边沁比斯密更甚之），支持一种能让财富总额和个人所获财富及收入数量达到最大化的经济体系。斯密和边沁对待平等主义者的态度都是温和的。他们不是极端的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平等，这对于提升人类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贵族阶级。这个阶级毫无生产力，却能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他们力图改变那样的世界以及那个阶级的状况。他们属于今天所说的政治左翼派。斯密追求的是国家财富，即所有人的财富，而非一小撮阶层的财富。

斯密，尤其是边沁，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的继承者们一样，并不惧怕推动政府履行其职责。他们明白，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们支持通过政府行为来创造标准。他们倡导政府公共工程和学校，认为政府在货币机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赞成新兴的福利国家活动。人们普遍认为斯密、边沁和一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极端反对政府活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雅各布·瓦伊纳认为，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斯密“在上帝的指导下，以自然和谐秩序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他的道德体系”。²在《国富论》（1776）中，斯密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经济范

畴。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斯密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上帝力图创造出最大的幸福的世界。

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伟大的见解是劳动分工，我们今天也将其称作劳动专业化。他所举的著名的别针制作的例子至今记忆犹新。可以将其看作量化经济学的开始。如果一个人要去干别针制作过程中所有的工序，“他可能一天也就勉强做出一枚，肯定不可能做出二十枚”。但若采用分工流水线的方式来做，“十个人……可能一天就能做四万八千枚”。³使得国家财富产生成为可能的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恰恰是劳动分工。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分工不明确，个人生产力也就更加有限。

此外，最有效的劳动分工需要自由的市场和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如果没有自由的市场，人们之间的贸易交往受到限制，经济就不会有应有的繁荣。同样，如果没有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无论是什么，并非全部），人们也就没有创新和尽可能去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应该尽可能地让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开放。市场越大，劳动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越大，全民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让这些最能充分利用资源、生产效率最高的人来掌控资源。他们能在特定的任务中提供最好的服务，或者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特定的产品。该市场并不总是完美运行，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和民主一样，虽然自由市场是一个不尽完善的制度，但它是我们所拥有过的最好的制度，能确保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最多样化、最高质量的商品并提供最好的服务。

斯密的智慧在于，他发现只要允许人们互相交换商品和服务就能鼓励经济生产。“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造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

自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不是和他们的人性交谈，而是和他们对自己的爱交谈。”⁴正是这份社会自然的利益和谐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为他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也就更加富有，总体经济也才会更加繁荣。

斯密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中的财富和收入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因为国家财富不是其他，正是组成它的所有个体财富的总和。斯密的理论体系反对不平等，除非有必要创造更多总产量，并且能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更高的收入和财富。他和启蒙运动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致，提倡本质上的人人平等。他尤其反对导致财富集中的土地继承相关法律。他在《国富论》中评论道：“完全为自己，从不顾及他人，这似乎是人类在每个时代里的卑鄙格言。”⁵他认为商业、土地所有和官僚阶层在道德本质上不可靠，相关的评论贯穿《国富论》始终。

斯密支持旨在使全体民众而不只是其中一小撮群体获益的政府行为。瓦伊纳这样概述斯密的观点：“当政府行为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时，是正常的，因而是有益的；但当它伤害了社会的总体利益时，则是不正常的，因此是恶劣的。”⁶在《国富论》中，斯密认可以下领域的政府角色：参与货币制度；检定诸如“盘子上的英镑标记和亚麻及羊毛布匹上的印戳”⁷等生产实践；要求支付工人现金而非货物形式的规定；关于各种垄断的规定；包括街道清扫在内的卫生标准；提高公共卫生标准以阻止疾病传播；包括高速路、桥梁、运河和港口的修建与运营在内的公共工程；政府对公园的所有权和运营；专利和出版权法律；房贷规定；利率规定（他认为最大利率应为5%）；邮政服务运营和提供公共教育等。

瓦伊纳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斯密支持政府对个人行为的限制，

这些限制不涉及公平和防卫。其唯一的目的是提高个人行为对资本的投资、商业过程和劳动力雇佣的指导性”。⁸ 斯密赞同用税法来削弱包括烈性酒消费的一些现象，而且支持对豪华车辆征收高于货车的养路费，借此，“很容易让富人（可能）的懒惰和虚荣为救济穷人做出贡献”。⁹ 他提倡对租赁协议做详细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被政府提高了价值的土地征收高于平均水平的税收，且支持累进税制。在《国富论》中，他写道：“让富人为社会开支做贡献是合理之举，贡献值不但和他们的收入成比例，而且应当高于此比例。”¹⁰ 斯密认为，存在一只自然自发秩序的“无形之手”，它能使总体幸福最大化。这只“无形之手”包括推动公益和社会平等的重要政府行为。¹¹

但是，仅仅或者主要把斯密描述成国家福利萌芽期的支持者却并不准确，尽管他的确是。斯密的主要贡献是阐释了一个系统，该系统不由政府控制和引导，就能获得最大的经济生产力和经济生产总值。他的作品均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于革命的第一年去世了）。他可能并未预想到这次革命能给社会带来的实际变化。若是他能活得更久一点，必定会支持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斯密备受早期法国革命领导人的敬仰。他支持美国革命。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并非宗教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寻求的是今生的最大化幸福和最高生活标准（两者在他看来同义）。

斯密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削减政府和传统观念的作用。政府和风俗习惯对经济活动的禁令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斯密认为，他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然的自由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显著政府作用基础之上。在该系统中，经济生产总值能够达到最大

化且分布均衡。他的重点是政府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和行动的相融并济，能够给人们创造最好的生存环境。

斯密最亲近的也可能是最要好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曾写道：“斯密相信，基于对人类本性和人类历史的观察，建立一门真正的人类科学是可能的。这门科学不但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组织原则，还能解释开明的统治者遵循的政体和立法原则。这些统治者想让国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想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¹² 因此斯密主张的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小作为。芝加哥托马斯·索威尔和詹姆斯·布坎南也非常赞同该观点。索威尔指出：“于斯密而言，平等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¹³ 布坎南说：“一个原原本本的亚当·斯密和现代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相距甚远。”¹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亚当·斯密、里卡多和马尔萨斯的作品中没有‘放任主义’这个词。这样的观点也从未以教条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作者身上。”¹⁵ 极端反政府主义的观念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哈耶克的“伪”个人主义¹⁶）更加类似，而不是英美的历史实用主义传统。在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之前，伟大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呼吁政府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他们是宗教上的左派——不可知论者、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无神论者或是谦逊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某种科学家（最初被称作“哲学家”），会遵循真理的引导，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存在教条主义者。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明确表明了他的功利主义立场：

有观点认为，神圣的上帝在永恒之中用仁慈和智慧设计并管理着